

上篇

“N - S 观” 及其对基本经济 现象的解释

第一章 需要理论的进展与“N-S观”

本书所谓“N-S观”，是指人的需要（Needs）与他满足自身需要的实力（Strength）相互作用的观点，它由本书关于需要的一组基本观点和关于实力的一组基本观点共同构成，即二者共同构成“N-S观”的观点体系。

一、需要理论综述、评价与新进展

现有需要理论的典型观点广泛分布于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中。

在现有经济或管理理论中，个体的人都是最小的分析单位，因而有关个体的人的天性（或称为本能、欲望）的基本假设被作为相关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之一。在经济理论中，人的欲望或需要常常用“效用”一词来表示（“效用”一词有时也用以表示物品的属性，即物品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在本书中，按照多数经济学教材的定义，“效用”一般指人的需要满足的程度）；而在管理理论中，经常是用“需要”一词来表示人的欲望或要求。而为了表示个体的人的全部欲望或需要的总和及其相互关系，经常使用的术语是人的“需要结构”（或“效用体系”，有时也泛称为“价值观体系”）。

（一）经济理论与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

1. 经济理论中的人性假设

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人”假设长期占主流地位。“经济人”这个最先由帕累托引进经济学的名词，被约翰·穆勒描绘成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类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和动机，即效用最大化动机。

经济人假设尽管简单抽象、不涉及人性的复杂结构和内容，并且建立在其上的相关经济理论（尤其是微观经济理论）在形式上也较完整而严谨，但它却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脱节。此外，现有经济理论中与“经济人”相关的边际效用或边际偏好的研究通常是描述性的，缺乏原因分析，即多是描述边际效用或偏好是怎样的或是怎样变动的，而较少从人性的结构上分析人的边际效用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变动。也就是说，现有经济理论回避了对“人性”内容和结构的深入、完整理解，顶多只是就人性的某一方面（如经济方面）进行分析，因而只涉及人的需要结构的表层。

“经济人”假设把人所追求的目标看成是“经济利益”这个自变量的一元效用函数，不断暴露出与现实的不一致，因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挑战（刘清华，2000）。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大致分为五个层次（Maslow, A. H. 1987），使个人目标成为多元效用函数；西蒙用有限理性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质疑（Simon, H. A. 1988），等等。

还有学者在“经济人”基础上提出“效用人”假设（刘清华，2000），即把人看作是具有多元效用函数（成本函数

和收益函数)的个人,他有着物质、财富、官能、利他等多种欲望,这些欲望的实现都能给他带来满足,而他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只具有有限理性;“效用人”假设还认为人的基本行为动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人们行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即由于各人的价值观的不同,不同的人对收益和成本的主观评价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然而,“效用人”假设虽然有助于克服“经济人”假设过于片面因而与现实的不一致,但由于对“效用人”的多种欲望(或需要)之间的关系缺乏一个自成逻辑的完整的理解,因而“效用人”的各种欲望显得过于复杂且相互关系混乱,从而大大增加了以“效用人”为基础进行理论研究的难度。

2. 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

与经济理论研究稍有不同,管理研究因为更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要求对人的本质具有更感性的认识,因而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管理理论中比在经济理论中更为丰富(尹毅夫等,1995)。管理研究中,众多学者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其代表性观点如下。

(1)“经济人”假说。管理研究中的“经济人”假说与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起源不同,它是伴随着20世纪前后泰勒制的出现而盛行的,其核心是把人看作经济动物(卢盛忠等,1993),认为人的各种行为的动力在于追求本身最大经济利益,工作的动机在于经济报酬。

(2)“社会人”假说。这是在20世纪30~50年代霍桑实验后出现的。它认为满足人的社会需要比经济报酬更能触动人的积极性(卢盛忠等,1993),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人的积极性

的决定性因素，物质刺激只有次要意义（尹毅夫等，1995）。

（3）“自我实现的人”假设。这是20世纪50~60年代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的产物，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都有充分发挥自己潜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本性。

（4）“复杂人”假说。这是美国心理学家雷恩提出的，认为人不是单纯的“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而是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变化的“复杂人”，它认为人的欲望结构不相同、不固定，并且与周围的组织、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人的满足感取决于其自身的动机结构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关系。但它没有对人的多种欲望的相互关系进行自成逻辑的深入分析，也没有考虑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属性（卢盛忠等，1993）。

（5）层次需要论。马斯洛把“复杂人”的多种需要具体化、层次化（Maslow, A. H. 1987），认为人的需要按先后顺序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通常，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为主导需要。

（6）E. R. G理论。阿尔德法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简化为三种：生存（或存在）需要、关系需要、成长需要（尹毅夫等，1995）。他认为，每一层次的需要愈少得到满足，则愈希望被满足；低层次需要越满足，就越要求满足高层次需要；高层次的需要满足越小，则低层次需要就越迫切。

（7）麦克里兰的成就需要理论。麦克里兰将马斯洛理论延伸，认为人的需要包括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情感需要三大要素（尹毅夫等，1995），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上述三种需要，不过各人的组成比重不同，因而人的行为特点也不同。

（二）对经济及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的评述

由以上经济研究和管理研究中对人性或人的需要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到，经济或管理领域中的有关探索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如两个领域中都有“经济人”假设，其中都是把经济利益作为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因；又如经济研究中近些年来出现的“效用人”假说等，与管理领域中的“复杂人假说”、“层次需要论”、“E. R. G论”、“成就需要论”等，都认为人的需要或效用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然而，现有经济及管理理论对人的需要（或称为效用、欲望）问题的探索，也有明显的不足（夏冬，2001）。

1. 概念的一致性问题

现有经济及管理理论中用于表示人的“欲望”的同义或近义词很多，如人的“需要”、“效用”、“动机”等，而表示“人性”的同义用语还有“人的本性”，“人的天性”等。并且同一词汇在不同的场合也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如“效用”一词有时表示人的属性，即人的某种欲望，有时表示物的属性，指物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欲望的属性；又如“需要”一词，有时是名词含义，指人的某种欲望，有时是动词含义，表示“想要什么”的意思。这种概念上的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经常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偏误（夏冬，2001）。

2. 研究内容上的不足

经济理论中涉及人的需要问题较多的是效用理论，而效用理论虽然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原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重要观点，却没有说明人为什么会有某种特定的需要结构，以及人的

偏好为什么会发生变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人的本性是什么”以及“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人的需要结构或个体效用体系是什么”等问题。

而管理领域的层次需要理论等，虽然提出了关于需要结构的一些观点，但是这些“需要”是刚性的，而不像现实中那样是复杂多变的；这些需要的来源，以及不同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未得到自成逻辑的说明。

此外，现有经济及管理研究中未就“需要”或“效用”与自然物质世界的关系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即现有经济及管理研究中的“需要”或“效用”缺乏自然物质基础（夏冬，2001）。

现有需要理论很少考虑需要的满足问题，而是将该问题完全推给了其他学科（例如将食品需要的满足推给农学等），基本没有涉及需要满足的一般性规律。

在当今经济和管理领域的理论及实践日趋深化情况下，对人的需要结构（或称为效用体系）的研究内容的不足已经限制了人们对现实实践的有力描述和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因而有必要对人的需要结构（或效用体系）问题重新加以审视，以丰富充实其研究内容。

3. 方法论上的不足

现有关于人的需要或人的欲望的具体内容的探索，多是以归纳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例如几种层次需要理论（马斯洛、阿尔德法、麦克里兰的层次需要理论），都通过观察把人们的需要用归纳法划为几个层次。然而，单纯的归纳法却有着先天的不足（夏冬，2001）：一是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及影响人的需要结构变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单纯的归纳

法不可能容纳不同类型的人的所有需要，也不足以成为预测人的需要的变动的逻辑基础；二是归纳法不能说明人的各种需要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即不能说明个体的人的需要结构或效用体系的内在逻辑；三是由于已有研究所单纯使用的归纳法的局限，使得已有研究未能说明人的各种需要与自然物质世界的关系，这样人的各种需要成为空中楼阁，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因此，有必要寻求新的分析方法，以为探讨人的需要结构问题开辟新的思路。

（三）人性问题新探索

尽管未曾有过被普遍接受的、明确的结论，然而人类对自身天性的探索却从未停止过，近年来一些学者也不断提出了各种人性模型。如耶鲁大学罗伯特·爱波菲（Robert E. Apfel）于2001年提出一个“3A”模型，认为人的基本天性包含三个元素，即动物性、适应性、权威性；又如香港中文大学罗山和也从人类有限理性角度提出一个人性模型。但是这些模型对人类天性的描绘仍然较为片面，本质上仍然以归纳为主，有着上面所提到的归纳法的种种不足。

因此，鉴于归纳法的上述缺陷，本书提出：应当以逻辑方法和实证方法的结合来代替片面的归纳研究方法，运用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重新审视人的基本天性及需要。

这里所谓的“实证”，是指相关研究应当立足于人类考古学、人体医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人类现在及过去所具有的“自然生物特性”，以及历史学和考古学等所揭示的人类曾经历的“生存环境”。而这里的“逻辑”，是基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有着如此这般生物自然特性，并且经历过漫长的

如此这般的生存环境的人类，其个体“必须”具有什么样的“天性”（本书称为“天然需要”），才能使人类这一物种生存到今天？或者说，人类如果不具有怎样的“天性”或“天然需要”就不可能生存到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合理推论，是本书揭示人的“天性”的逻辑推理基础。

1. 研究方法上的新曙光

近年来对人的本性的研究，有一种回归于生物适应性选择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倾向，并且这一倾向与现代基因遗传技术的进展相联系。一些研究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即不仅人的生物有机体是自然选择和人类进化的产物，而且人的天生的欲望，也是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的产物。如果把人的“天性”（或称“人的天然需要”，“人的本性”等）看作是人“天生”具有的与自身生物自然属性相一致的某种行为倾向（这里的行爲，不仅指看得见的动作，还包括看不见的精神心理活动），那么，这种行为倾向之所以成为“天生”的，是由于长期的物种选择和生物进化，使只有那些具有这些行为倾向，并且这种行为倾向以遗传基因的形式稳定传递下来的个体，才能在人类所经历的生存环境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所谓“天性”，是指如果不具备这些被称为“天性”的行为倾向，或者这种行为倾向不能稳定地传递下来，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并繁衍至今，而那些现在还正常地生存着的人的个体，“必然”带有这种天性，并且能够将其传递给后代。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产业关系中心的 A. 本那认为（Robert E. Apfel, 2001），利他需要是人的天性之一，这是因为人类长期的狩猎生存环境使那些没有利他和合作本能的个体容易被淘汰，而那些能够在漫长的狩猎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群体，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利他

与合作的本能。牛津大学的 H. 尼伯格在其《人性的科学研究》一书中，把个体基因的差异作为影响人的个性和智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关基因决定人的需要结构或行为倾向的例证还有很多，如附录 2 (1) 中所列出的]；由于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所以尼伯格的观点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即自然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个性，使那些不具有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的个体较易被自然界淘汰。

近年来对人性问题的这些新探索，虽然内容上仍不完整、研究方法上也未明确，却使人们看到研究人的天性（或天然需要）问题的方法论上的新曙光，给人以如下启示：

既然人的天性是由生物基因所传递下来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在人类的一定的自然生理条件和人类进化中的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由医学、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等领域提供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人的个体必须具备哪些“天性”（即行为动力倾向），才能够生存到今天？换句话说，人类若不具备哪些“天性”，就不可能在地球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到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的天性和需要结构开辟一个新的途径。

2. 个体的人的需要结构的一个概念模型

为避免概念上的混乱，首先需说明，在本模型中是用人的“需要”表示人的效用、欲望、动机等；此外，本概念模型中的“需要”是名词含义，与动词含义中的“想要什么”不是一回事。行为科学中，对于名词意义“需要”的含义有多种陈述，本书认为，个体的人的需要是指人体神经组织由于存在生理紧张，而产生的消除这种紧张，达到人体内部各组织的和谐，以解决内在生理矛盾和心理矛盾的动力状态；也就是人体

内不同组织（尤其神经组织）内部或相互之间由于存在物质能量上的不和谐，而导致的消除该不和谐的内在趋势。

本书中，用“天然需要”表示由遗传基因所传递的、个体的人天生所具有的行为动力状态或天性，而用“后天需要”表示人个体所具有的、由“天然需要”演变派生而来的各种动机、欲望或者目标。本模型中，个体的人的“需要结构”，由他的天然需要和后天需要共同构成，它有时也可称为个人的“效用体系”、“效用结构”或“价值体系”等。

(1) 个体的人的“天然需要”。具有一定生物自然属性和生理构造的人类，若要经由其所经历的生存环境生存到今天，其个体必须具有哪些与生俱来的“天然需要”即天性呢？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的有机体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人的天性（或天然需要，天生的行为动力状态）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来的，即那些即使不存在也不会影响人类生存到现在的“需要”可以从人的天然需要中被排除。由此，个体的人必须并且只须具有两类天然需要（夏冬，2001），第一类是维持个体生存的需要，第二类是物种传代的需要。没有这两类与生俱来的行为倾向，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到今天。而有了这两类行为倾向，在人类这样的生物生理条件以及人类所经历的地球环境条件下（这些由自然科学所揭示），人类就可以存在到今天。

维持个体生存所必须具有的天然需要或行为倾向，其最基本的作用，是使具有现有的正常的自然生物特性的个体的人能够在地球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存活下来，依据这一“条件”，第一类天然需要（维持个体生存的天然需要）可分为以下基本种类：

吃喝拉撒睡等生理需要；

避免危险的需要；

发挥个体生物生理条件，保持活动的生理心理平衡的需要，如求知欲、冒险欲等等；

统一性需要，指个体的人的多种需要相互整合，以保持精神和行为的统一，从而防止精神分裂及行为上的自相矛盾等有碍个体生存的情况出现。

上述几种需要是维持个体生存所必须具有的，因为如果个体不具有这些天生的本能，那么以人类特有的生理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在从过去到现在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是基本稳定的，它们由自然科学如解剖学、人类学等所描述），以及人类所经历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这由考古学、地质学、历史学等来反映），离开这些，个体的人是不可能生存的。

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之所以能繁衍并延续至今，其个体还必须天生地（即遗传地）具有以下一些需要（第二类需要，即物种传代的天然需要）：

性的需要；

哺育后代的需要；

交往的需要。

显然，没有性的需要，人类不可能产生后代。没有哺育后代的需要，后代不可能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长大成人。而交往需要是人类长期的群居及共同狩猎生存方式（人类有 99% 的时间是以群居和狩猎的方式生存的，路恩·梅克，1995）沉淀于其生物基因层次上的一种本能，这种生存本能使具有交往与合作行为倾向的人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此外，交往还为性需要的满足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而这也有利于物种的繁衍与生存。

（2）天然需要向后天需要的演化：“后天需要”的形成。

个体的天然需要是依赖于人的生物遗传基因的，是生来具有的，在天然需要方面，人与其他高等动物有着较大的相似性。为了满足天然需要，个体要从事一定的活动，而物质能量方面的限制要求减少其活动的盲目性，这就要求个体运用其“认知——联想”机制进行决策，即收集信息—处理信息—采取行动，以保证以较少的物质能量消耗来满足需要，即：“认知——联想”机制是需要满足的重要的实现机制。本书认为，正是人的高度发达的“认知——联想”机制，使人的需要结构（或个体的效用体系）在后天需要方面要比其他高等动物要复杂得多。

作者认为，依赖于人的神经生理系统的高度发达的“认知——联想”机制，是联结人的天然需要与后天需要的桥梁，也是人的需要结构有别于其他高等动物的“需要结构”的生物学根源；高度发达的“认知——联想”机制使人具有远远优于地球上其他高等动物的信息收集、信息处理能力，从而使其他高等动物更加了解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事物及其相互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对自身的需要满足的意义。这样，人就比其他高等动物具有多得多的满足自身天然需要的途径和方式，这些“途径和方式”本身可能成为人们行为的新目标，即成为一种由天然需要派生而来的“后天需要”。各种后天需要还可以在人的“认知——联想”机制的基础上，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以“目的——手段”链的方式延伸、交错、相互影响，构成复杂的但又以天然需要为核心的人的需要结构体系。

此外，由于“认知——联想”机制是天然需要向后天需要演变的桥梁，而“认知——联想”机制所收集和处理的信
息，在内容、方式甚至结果上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体

的神经系统特征及其变动的的影响，因而后天需要具有较大的与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相互适应的“流动性”，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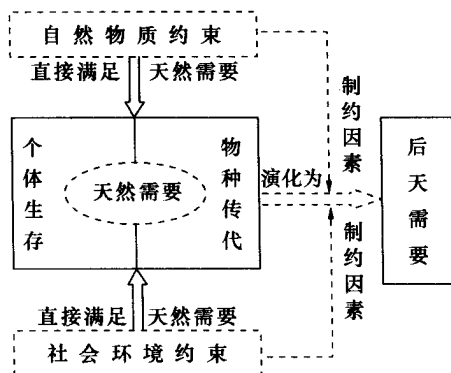


图 1-1 自然物质约束和社会环境约束影响天然需要的直接满足及其向后天需要的演化

注：(1) 本书为了叙述方便，把能够派生出新的需要的需要，称为“根需要”，而把被派生出的需要，称为“根需要”的“子需要”。(2) 天然需要的满足过程，往往伴随着后天需要经强化而派生演化并得到满足的过程。

图 1-1 反映了本书“个体人的需要结构的概念模型”的基本内核。

(四) 进一步的思考

1. “效用最大化原则”、“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以及“决策”的生物自然基础

如果把人的天然需要或天生的行为倾向看作是自然界长期的适应性选择和生物进化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对效用最大化原

则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两条经济学基础准则以及决策的必要性，从生物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角度加以解释（夏冬，2001）。

效用最大化原则。效用就是需要的满足，因而该原则在本书中有时也称为“需要满足最大化原则”，即人们希望使自己总的需要满足达到最大。人类（甚至所有物种）长期生存在有限的食物、有限的资源，以及有限的能源供给的环境中，而人的需要的满足是要消耗一定能量和物质资源的。如果人满足自身需要所耗费的能量或物质在一定时间内超过了他们从需要满足中所能获得的物质和能量，那么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的个体生命就难以存活。换句话说，能够存在到今天的人类，其先天所具有的行为倾向中，必然有一种寻求使其“所得超过所支”的本能（这种本能以诸如对水、食物的需要，以及避寒的需要等方式体现出），以实现生物生理上的物质能量平衡，否则就不可能生存下来。这种本能就是“效用最大化原则”的生物自然基础。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的有机体的生存，不仅要求他所支付的能量与物质同他所获得的能量与物质相比是平衡的，而且要求他所获得的各种物质在比例上是平衡的。人的生物特点要求他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无限制地片面追求某种单一的需要和满足，自然生物属性要求个体的人的物质和能量代谢在时间上、种类上保持平衡，而这一要求是通过边际效用递减的行为机制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不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行为倾向的个体，无法保持其物质和能量代谢在时间上和种类上的平衡，因而也就不可能生存到现在；而能够生存到现在的个体，必然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行为倾向。

关于边际效用递减的生理实现机制，尽管还未完全清楚，

但是也有一定的研究和猜测，一种猜测认为与“电位差机制”、“电流量机制”这两种可以通过神经生理机能来实现的机制有关，如图 1-2 所示。该猜测本身可能并不完备，但它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即依靠神经生理机能完全可能实现边际效用的递减。该猜测的要点如下。假设：（a）高低电位之差 h 可以表示“某种需要的强烈程度”。（b）此时消费一单位物品或劳务可以释放的生物电流能量 E 为（电位差 $h \times 1$ ），（若消费一单位物品或劳务所产生的生物电流量固定为 1），假设可用释放的能量 E 来体现消费一单位物品或劳务所带来的需要满足。（c）又假设电位差 h 高度的增加受该物品或劳务的稀缺性、当事者的生物周期影响，其减少受消费该物品时被神经系统感受到的释放的能量的影响，如上述消费第一个单位物品时释放的能量（ $h \times 1$ ）使电位差下降 h_0 到电位 3，消费后的需要强度可用 h_1 体现。（d）则消费第二单位物品所释放的能量或带来的需要满足为（电位差 $h_1 \times 1$ ），小于消费第一个单位物品时释放的能量或带来的需要满足（ $h \times 1$ ），可见边际效用递减。（e）对于某些边际效用递增或为负的情形，“电位差机制”或“电流量机制”仍然可以对其进行解释，只是这时情况要复杂些。



图 1-2 猜想：边际效用递减的生理实现机制